



新疆莫尔寺遗址:

见证丝路文化交融



莫尔寺遗址。

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进一步实证并展示了自汉至唐,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这座古代佛寺历经千年岁月何以重焕光彩?重见天日的出土文物又讲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哪些故事?

双塔见证千年佛寺变迁

莫尔寺遗址,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30多公里外莫尔村附近一处洪积台地上。最显眼的是两座土坯佛塔,一圆一方,遥遥相望,如两枚巨大印章盖在茫茫荒原上。“莫尔”,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里是“烟囱”的意思,当地老乡把耸立的佛塔当作烟囱,莫尔寺遗址由此得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千年来虽饱受风雨侵蚀,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后被冲下的泥土持续覆盖,得以保存至今。自2019年开启考古项目以来,考古人员持续不断收获惊喜。“第一次去现场勘察,从地面上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工作的余地。”肖小勇回忆说,当时除了一圆一方两座佛塔,地表仅能见到几处残墙遗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但发掘不到半个月,第一座僧房出现,让考古团队看到希望,“地下埋藏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

6年间,在考古人员手铲下,僧舍、回廊式佛殿、长方形大佛殿、讲经堂、厨房、储物间、餐厅等建筑纷纷浮出水面。共发掘4600平方米面积,发现遗迹包括18座单体建筑共计62个房间,2条阶梯式踏道,出土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莫尔寺既有自身特色,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犍陀罗、中亚、当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肖小勇介绍。新疆喀什,古称疏勒,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通道交汇处,各色文化艺术在此地融合荟萃。肖小勇介绍,莫尔佛塔(圆塔)是高覆钵式土坯塔,采用犍陀罗传统的窠塔波样式,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已经屹立了1800余年。相隔约60米,由5层塔身和大型台基构成的方形实心土坯塔(方塔),台基边长39.36米,仅比位于河北的、东魏北齐时期郾城赵彭城佛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规模接近皇家寺院等级。一圆一方,风格迥异,两座佛塔在漫长岁月中并肩依存千余年。“公元1-3世纪,以圆塔为中心,附近和旁侧非对称分布僧房,公元4世纪以后,遗址的礼拜中心变为塔、殿并重,最后向以具有中原建筑布局特征的长方形大佛殿为中心转变,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讲堂、厨房和方塔等。10世纪上半叶,寺院建筑被毁后废弃至今。”肖小勇介绍,从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的发展演变,可看出中华文化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中国化进程,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

探索地面佛寺起源的实证

作为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年代最早、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古疏勒佛教历史与考古研究的空白,实证新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为追溯我国地面佛寺源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佛教诞生于印度,传入新疆的时间说法不一,主流观点是公元前1世纪左右,从于阗或疏勒传入。文献记载,西去求法的高僧,无论是法显、还是玄奘,都

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残存于游记、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留给后人无尽遐想和遗憾。因此,这座地处西域四大佛教中心之一,由佛塔、佛殿和僧房等遗迹构成的大型、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尤为珍贵。一百多年前,该遗址因被掠夺等原因,仅留下有限的文字和图片记录。此后,在我国第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遗址有了初步测绘等信息,但遗址范围、布局、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自2018年新疆考古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以来,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被列入“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华化的考古研究”课题,由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发掘。

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湮没史海千余年的疏勒佛教文化遗存,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动物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黄牛和马骨,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记载;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种属;运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探测地下遗迹……多学科技术深度介入,让考古发掘提取的信息更丰富,文献里干瘪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以往佛教何时传入西域,大家都是从文献记载得出的认识,而莫尔寺考古系列碳14数据结合遗迹遗物,提供了考古证据:在公元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介绍。

古刹探源续写交融故事

对考古专家而言,以海量文物为线索,完成历史拼图,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仍在继续。在已出土的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中,有大量石膏佛像残块,专家根据部分残块分析,莫尔寺最高佛像可达4米;结合古籍记载,以及出土佛像特点、开元通宝钱币、泥瓦、贴金佛像手指等综合分析,莫尔寺遗址长方形大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



莫尔寺遗址小台地北部建筑、排水沟遗迹。

考古工作人员在莫尔寺遗址现场进行考古绘图。

文献记载,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州人士”。李文瑛介绍,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唐朝时中央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天山南北,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当然也包括宗教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肖小勇认为,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后,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传播中心,并影响到库车及更远的地方,继而向中原地区传播,与当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动格局。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专家有了更多发现。肖小勇认为,莫尔寺遗址附近在汉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此外,莫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约5.2公里的汗诺依古城遗址,东面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西面约30公里还有三仙洞石窟等,进一步说明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当地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2024年10月,《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2024-2035年)》获国家文物局批复,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已提上日程。成功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莫尔寺知名度日渐响亮,搭乘南疆火车的游客,得知途经莫尔村附近时,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莫尔寺的身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军说,下一步将对莫尔寺遗址历史信息进行完整展示,全面、准确阐释其历史文化价值,并整合周边文化资源,让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研究、展示等为一体的功能,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重要载体,有形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益州太守章”。

走进河泊所遗址,考古人员正在几个探方内开展发掘和清理工作。这是一片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的冲积平原,古时侯台地与河道交错分布,确实是人类栖息和筑城的理想之地。发掘现场往北约一公里,便是石寨山古墓群。1956年,考古人员在石寨山遗址清理一座大墓时,发现一枚金质“滇王之印”。

这个重要发现,揭开了尘封2000多年的古滇国神秘面纱,石寨山古墓群被认定为古滇国王族墓地。《史记》中简要记载了古滇国的情况,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后来汉武帝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金,复长其民”。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说:“古滇国本身没有文字,但出土了数千件青铜器,留下了丰富的‘无字天书’。”曾经创造辉煌青铜文明的古滇国后续发展如何?古滇国的都邑到底在哪?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考古学界。河泊所遗址的新发现,有助于揭开这些谜团。

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是从商周延续到汉晋的大型聚落遗址、古滇文化的核心居住区,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是从商周延续到汉晋的大型聚落遗址、古滇文化的核心居住区,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是从商周延续到汉晋的大型聚落遗址、古滇文化的核心居住区,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

体现和平包容的“双城记”

“近年来,河泊所遗址发掘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河泊所遗址考古队队长、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新的考古发现确认,河泊所遗址是古滇国都邑和益州郡郡治。两座城池比邻而居,上演了一段‘双城记’。”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是从商周延续到汉晋的大型聚落遗址、古滇文化的核心居住区,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

云南河泊所遗址:

读懂西南边疆“从多元到一体”

自古民族众多、曾建立古滇国的西南边疆,在西汉设置益州郡、实行郡县制后,是如何融入中华文明“一体”格局的?近期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云南河泊所遗址,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河泊所遗址发掘揭开了益州郡郡治的面貌,出土了大量两汉时期的简牍、封泥和建筑遗迹等。考古学界认为,这些重大发现见证了西南边疆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对研究秦汉之际西南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具有突出价值。

蒋志龙介绍,河泊所遗址西部发现了密集的居住区、祭祀区和手工业区,出土了“滇国相印”封泥和大量古滇文化遗存,被认定为古滇国都邑。河泊所遗址东部发现了大型建筑遗迹、宽达12米的道路、水井和灰坑等丰富遗迹,特别是去年发现了从汉代延续到魏晋的城墙,以及“益州”铭文瓦当,证明这里就是2000多年前的益州郡郡治。考古学界认为,河泊所遗址的“双城记”,表明汉武帝设置益州郡时,没有对古滇国取而代之,而是在它旁边建了一座“新城”。这一做法既保留了古滇国的文化基因,又展现出中央王朝营建新城、推行郡县制的治理智慧,是中华文明和平性、包容性的生动体现。

大量简牍封泥见证汉代边疆治理

河泊所遗址另一项令人瞩目的发现,是出土了大量汉代简牍和封泥,堪称汉代边疆治理的文献档案库。“目前已发现简牍5万多枚,其中有字简牍1.4万余枚,保守估计不少于10万字。”蒋志龙说,这些简牍出土于多个点位,主要是灰坑和水井中,推测为文书资料销毁场所。河泊所遗址汉代简牍的出土,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一件大事。

此外,“滇池以亭行”“益州太守府以邮行”的简牍表明儒家思想在汉代已在西南边疆传播。简牍中发现了“滇国”“滇延”“滇相”等记载,显示古滇国和益州郡同时存续了一个时期,而且中央王朝派遣了官员协助滇王治理滇国事务。河泊所遗址的发掘成果证明,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一个缩影。目前,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积极推进,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整理、研究阐释等工作仍在进行。考古学界相信,将有更多新的考古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

河泊所遗址的发掘成果证明,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一个缩影。目前,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积极推进,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整理、研究阐释等工作仍在进行。考古学界相信,将有更多新的考古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

河泊所遗址的发掘成果证明,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一个缩影。目前,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积极推进,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整理、研究阐释等工作仍在进行。考古学界相信,将有更多新的考古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上下内外的公文往来非常紧密。私印封泥涉及大量人名,印文既有张、王、李、赵、宋、高、陈等常见的姓氏,还有诸如“隗序”等疑似少数民族汉语姓名,这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直接体现。

印证中华文明在边疆的演进特质

河泊所遗址考古研究的丰富成果,不仅勾勒出古城的轮廓,更深刻印证了中华文明在边疆演进的特质。——揭示了益州郡郡治面貌,实证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长期有效行使治权。蒋志龙介绍,考古发掘初步揭示了益州郡郡治的主体结构和功能分区,城址主体结构由外环壕、护墙、内壕、城墙四部分组成,城内有东西向主干道,道路两侧有大型官署建筑遗迹,还有房址、水井和灰坑等。中央王朝在西南边疆推行郡县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樊海涛认为,设置益州郡都是一个里程碑事件。从益州郡设置开始,多民族聚居的云南开启了融入大一统国家的新阶段。

——见证了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陈伟认为,汉朝设置益州郡后,将文书、职官、户口、赋役、法律制度等系统地扩展到云南地区,开展有效治理,为开发西南边疆、建立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指出,就我国历史上边疆与内地的关系来说,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河泊所遗址考古的新发现,为西南边疆与中原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很好的考古实证。

——反映了西南边疆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学家王巍指出,纵观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虽然有分有合、进程曲折,但从多元走向一体,国家统一始终是发展的主线。河泊所遗址的新发现,完善了滇池盆地从商周到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是西南边疆从多民族地区融入国家一体化进程的考古实证。

河泊所遗址的发掘成果证明,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一个缩影。目前,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积极推进,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整理、研究阐释等工作仍在进行。考古学界相信,将有更多新的考古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

河泊所遗址的发掘成果证明,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一个缩影。目前,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积极推进,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整理、研究阐释等工作仍在进行。考古学界相信,将有更多新的考古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

河泊所遗址的发掘成果证明,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一个缩影。目前,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积极推进,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整理、研究阐释等工作仍在进行。考古学界相信,将有更多新的考古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



考古工作者对木简进行红外扫描。

新华/传真

新华/传真